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0)02-0181-06

新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张 瑞 兰

[摘 要] 在新中国前 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曾错误地把知识分子整体界定为被改造、被教育的“资产阶级”,把人民内部关系问题建构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确立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身份为标志,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了合理的重构与拨乱反正。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差距甚至是利益矛盾关系,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做法,而应该增强社会的粘合度与共识,构建可持续的、包括知识分子与工农在内的各阶层和谐的政治关系。

[关键词] 知识分子;工农;和谐政治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6 [文献标识码] A

众所周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构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动,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疑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大政治关系,采取何种方针政策来处理这一关系,也始终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十分重大而复杂的政治课题。而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内,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属于被工农“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从而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就不断演变为单向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关系,即单向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劳动化”,乃至知识分子成为改造、批斗的对象,使党和国家在处理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问题上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后,随着“左”的阶级话语逐渐淡出,在国家政策和正式的制度规范层面上,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被重构为一个阶级内的阶层关系,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认识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格局和阶层关系结构的不断调整 and 变化,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在政治身份一致的前提下,也表现出某些新的动向和新情况,亟须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探讨和总结。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在总结建国以来处理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问题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方面,阐释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内涵与时代特色,以期对构建我国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新型的、和谐的政治关系有所裨益。

一、“毛”与“皮”: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与工农相结合”

在建国后的前 30 年,特别是经过 1957 年“反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左”的错误干扰加深,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不断加剧,在有关知识分子政治身份、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的阶级话语和夸大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加以界定和构建的。在那时的政治关系和阶级身份的制度安排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属于“人民”和国家的“主

人”范畴;而知识分子则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成为被教育、改造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共产党已消灭了这“五张皮”,因此知识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了^[1](第 545 页)。知识分子必须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身份的转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此,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政治关系的实质和主要特点是:以工农为主导、以知识分子为附属、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结合”关系;虽然对于“劳动人民知识化”也有所提及,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策核心或重心,在于单向性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工农化。

此种以工农为主导、以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的“结合”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意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人民化。建国初期,面对大量“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何实现他们世界观的转变和“思想的革命化”,使之从立场上和思想感情上转向劳动人民,以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这确实是一个新生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样,在建国初期如何完成被“包”下来的广大国统区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就成为实现与工农相结合的第一步。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被视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第 49 页)。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被认为完成了阶级意识的转变。1956 年,知识分子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判定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第 102 页),又从政治上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另外一个阶级。于是,知识分子面临从政治立场到世界观的新一轮的改造,强调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其中“红”强调的是人民性和革命性,即政治立场是第一位的。至文革时期,则是对整个知识界的不信任,“再教育”成为实现知识分子阶级意识转变的手段。不仅包括那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右派知识分子,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的污染而转变阶级立场,1971 年全国教育会议的“两个估计”^①,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第二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强调劳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培养作用,目的是通过参加生产实践,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培养对工人农民的感情,以实现自身的工农化,最终消灭三大差别。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实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1957 年 8 月,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文革时期,这种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手段。知识分子纷纷被下放到农场、农村、工厂参加劳动改造,很多文化科研单位被整建制地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1958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指出:教育必须一反以往数千年的旧传统,采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种教育思想在文革时期也得到极端体现:在校师生陆续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些农、林、医、师范、工科等院校干脆迁往农村或在农村建立分校、教学点等。三,实行身份互换。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互换,来达到理想社会。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说是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举措。1966 年底,全国各地城镇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造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倒流。

第三是文化的大众化。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即知识文化,要贴近大众生活,为广大工农服务,打破知识分子在文化上与大众的隔阂。建国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文艺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提倡知识分子写出思想上无产阶级化、艺术上民间化的文学作品,这一思想在建国后被不断诠释和放大,成为文艺的指导方针。1949 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明确地向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任务。而且,普通民众的文化创造力被大力推崇,在“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中,出现了“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的一幕。1963 年及 1964 年,随着毛泽东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偏离工农兵方向的两个严厉批示的发表^②，“工农兵文艺”浪潮在全国兴起。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则把大众文艺推到极致,“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片面地要求文艺向大众看齐,事实上造成了文化的匮乏。

上述关系模式或者制度安排,和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乃至“继续革命理论”既有其逻辑上的联系,也有鼓励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对工农情感的认同、为工农服务的一面。但是,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预设却是:僵化、夸大地看待知识分子和旧的社会制度的联系,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工简单地等同为阶级差别甚至是阶级对立,无视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造成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和对体力劳动意义的片面夸大。与此同时,这种理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政治立场坚定,富有革命精神,强调:“工人农民的文化虽然不高,但是他们对于大是大非是很容易看清楚,而许多知识分子却做不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农民学习。”^[4](第1版)由于在制度安排上片面地把知识分子置于被改造、被教育实际上是被歧视的地位,导致知识分子长期被贬斥为“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永远背负着对革命的“原罪”,其身份地位得不到起码的承认及尊重,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社会弥漫着轻蔑脑力劳动、轻蔑知识本身的风气,乃至出现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没文化越革命”的愚昧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同时,这一制度安排把本来同属人民内部成员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人为地夸大、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关系。时至今日,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是“文革”遗留下来的这种深重的“历史记忆”不可能完全消失,轻蔑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阴影也并没有完全消散,甚至可能在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中被激活,形成改革中的路径依赖,这就为构建社会成员之间和谐信任的政治关系,为防止改革中出现社会疏离和“断裂”增添了难度。

二、知识分子与工农政治关系的重构及面临的新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开始从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对过去“左”的错误进行纠正和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新的、重大调整和重构。新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模式最重大的变化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制度安排中确认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工农一样是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平等、作用相当的群体,从而承认知识分子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一员。这一调整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趋势,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就社会的角度而言,这一政治关系模式的确立,也促使阶层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政治关系与利益关系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政治身份而言,知识分子从过去的“臭老九”一跃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对于工人、农民来说首先就发生了更为明显的改善。与此同时,人们也很容易从直观上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在分配和收入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虽然在改革开放初,知识分子在经济待遇上普遍偏低,存在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脑体“倒挂”问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执政党清醒地看到,发展知识经济、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和趋势,从而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知识的价值、脑力劳动者自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新的利益分配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必然日益凸显^[5](第83-84页)。相比之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则改善得比较缓慢,甚至下降成为“低收入群体”。农民虽然是改革之初的受益群体之一,但是,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剪刀差,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消除;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三农问题”以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利益造成的制度性歧视日益凸显,也使得农民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2008年8月28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

差距达到 9646 元^③。至于产业工人,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国营、集体企业的工人,并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水平、政治地位上都比以前出现很大落差。由于企业改制、转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这部分职工首先在地位上就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实质上的雇佣劳动者。在收入方面,除了部分垄断行业以及专业技术工人尚能保持稳定的收入增长之外,也有大批产业工人由于企业破产、改制等原因而下岗,失去了过去在单位享有的诸多福利待遇,成为收入微薄的城市“低收入群体”或享受政府低保的“弱势群体”。至于私企、外企工人和企业老板之间更是直截了当的雇佣关系,同时受法制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等因素的制约,工资待遇大多偏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这样,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相对明显改善,而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滞后甚至出现落差,而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政策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一些工人的现实境况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差,这就很容易使一些人产生失落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就农民而言,特别是“农民工”,往往被社会公众认为是“弱势群体”,难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因此,知识分子、工农这种不平衡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在身份自我认同、社会声望上的分化及差异,进而产生对待改革开放态度的分化和差异,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比如: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根源,在一些群体性的维权事件中,如上访、罢工、静坐示威等,工人与农民的比例就往往占绝大部分;而知识分子则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需求,群体意识日益增强,与工农的“距离”在增大。根据学者李路路的研究,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预示了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农民阶层潜在的排斥性^[6](第 115 页)。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工农之间还存在价值观的分化与差异。伴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的阶级和阶层也日益多样化,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阶层内部都经历了分化重组,形成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例,整个阶层就分为专业型、公务员型、经理型、业主型、中介型、自由职业型、个体户型等七个群体^[7](第 15-18 页)。这些众多的群体由于具体的职业、地位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必然造成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上的不同,从而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呈现出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趋势。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既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又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往往与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在许多方面相背离。学者李培林等人研究表明:人们在主观层面显示出碎片化的特征,未能形成一致的阶级意识^[8](第 15-16 页)。显然,这不利于知识分子、工农之间的认同及联系。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我国社会的主体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上述变化,虽然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后新的制度创新与必要的利益格局调整有关,但也给我国的和谐社会构建、转轨期政治整合带来严峻挑战和新的历史性课题。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认真加以澄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几个主要阶层之间不断拉大的地位和收入差距,增加他们之间的共识或思想上的“粘度”,而任由这种利益和思想上的差距加大,阶层关系就会变得脆弱失调,就极有可能造成社会“断裂”,严重损害执政党的凝聚力,进而危及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基础。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和谐政治关系的重塑

理性化、有机化的阶层关系,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重塑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和谐政治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问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多方配合,开展深入持久的研究。因篇幅和个人认识水平所限,这里择要提出几点粗略的想法,或许有助于增进解决问题的基本共识。

第一,应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从处理我国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与政治整合的高度认识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问题,寻求解决和处理双方之间关系的正确思路和目标。众所周知,2006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从中不难看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合理化问题。而阶层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特别是一个社会的主要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优化、和谐,则又是关乎整个社会和谐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关系的和谐、优化,使之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有机的政治关系,就是实现我国政治整合、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二,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工人农民地位下降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指导思想和解决思路:是坚持在改革与发展中解决,还是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无论是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答案只能是前者,只能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发展为中心的大原则下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能因为前进中遇到新问题新矛盾就动摇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方向,重返平均主义、“脑体倒挂”的分配制度。否则就纯属“折腾”,在这种制度下既得不到效率,也得不到公正。应该看到,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制度,而不是知识分子待遇改善、地位提高引起的。因此,我们既不能以牺牲知识分子的利益、牺牲效率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追求所谓的“公平”,也不能牺牲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改革与发展!

第三,构建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和谐政治关系,关键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精神,致力于构建一个合理的、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这一制度,能够把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能够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协调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使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保持大体上的平衡^[9](第5页)。目前党和政府正在沿着这一思路,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础上,贯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原则,重点解决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些阶层收入偏低的问题,并通过完善加强相关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工人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和权力寻租行为的打击惩治力度。今后,只要沿着这一大框架坚定不移走下去,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和制度,分配不公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

第四,构造涵盖面更广的核心价值体系,重塑各个阶层的价值共识,增强社会各阶层的粘合度。按照帕森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秩序有赖于该社会成员一致的价值共识。随着利益关系复杂分化,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及利益诉求,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为了更好地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党的意识形态必须表现得更加务实开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党的意识形态是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通过与不同价值观念对话,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比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等新的主流价值观,就包容了不同社会群体多方面的价值取向。这样,既确保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中的引领地位与作用,又可以使各种健康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各得其所、各尽其能,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最后,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知识的社会化,尤其是工农阶层的知识化。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是高度知识化的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应发挥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创新者、应用者的作用,完善各种体制机制,使知识社会化,使生产、知识与经济结合起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缩小阶层之间的物质差别。此外,应通过扩大教育公平,提高工农的知识水平,逐步促进工农知识化,缩小知识分子与工农阶层的距离,使其在社会分工和分配中的地位逐步得以提高。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10](第37页)。为此,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学校差别。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开办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提高工农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有利于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及社会的和谐。

注 释:

- ① 所谓“两个估计”,就是前 17 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② 两个指示指毛泽东 1963 年 12 月 12 日关于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的批示和 1964 年 6 月 27 日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批示说: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中问题不少;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 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 ③ 参见新华网北京 2008 年 8 月 28 日电,载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8-08-28。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 [2]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4] 《再论立场问题》,载《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29 日。
- [5] 祝洪娇:《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收入分配状况透视》,载《岭南学刊》2005 年第 8 期。
- [6]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 [7]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 [8]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载《社会》2005 年第 1 期。
- [9] 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载《求是》2008 年第 1 期。
-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s of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peasants in New China and Its Inspiration

Zhang Ruilan

(Basic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China of past three decades, th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overall wrongly classified as “bourgeoisie” and being remolded, and op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class being built between the people.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one part of “working class”, the relationships of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peasants have been reasonably reconstructed and brought order out of chao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ve been new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even the ga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peasants. It's not wise to repeat the past “left” wrong practic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ut to build a sustainable harmonious political relations of all status,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and worker-peasants of existing pattern of political relations.

Key words: intellectuals; worker-peasants; harmonious political relationships